

教育代际流动:理论、逻辑及实践转向

李文华 张务农

(河南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教育作为促进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实现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冲突主义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表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不仅为个人代际流动奠定了基础条件,而且为社会的群体流动提供了可能的实现路径。通过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选拔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向上流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推动形成群体流动的美好社会环境。

关键词:教育代际流动;理论逻辑;实践转向;个体流动;群体流动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1-0052-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105

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发展,社会各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大增加,这为农村弱势家庭子女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教育改变命运成为现实。然而,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扩张逐渐改变资源分配格局,并深刻影响到社会分层结构。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开始出现分化,城市中产阶层往往具备更多优势,成为教育的主要受益者。目前学界虽然针对教育代际流动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并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研究结论,且没能探究其内在逻辑关系,尤其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原有代际流动格局被打破的背景下,亟需探究基于时代特征的新的教育代际流动模式。鉴于此,本研究从教育与代际流动的逻辑关系出发,重新审视教育代际流动的理论逻辑,探寻教育代际流动的可能转向。

一、教育代际流动的理论辩驳

长期以来,教育在促进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以及教育能否促进代际流动或者教育是优势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一直是学界的重要话题。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两种理论观点推动了研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功能主义强调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和社会选拔功能,以及教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合理流动的积极作用。工业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劳动者拥有更高层次的知识技能,而教育为个体适应时代变迁和新的工作技能提供了基本保障,是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教育是社会代际

收稿日期:2022-09-27

作者简介:李文华(1990—),男,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张务农(1976—),男,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教育学一般项目“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检测机制研究”(BJA180103)。

流动的动力机制^{[1][2]},相关研究肯定了教育的这一功能。其中郭丛斌和闵维方(2009)运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子女的教育在社会地位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的代际流动功能明显^[3],即个体教育获得是代际阶层流动和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自致因素^[4];虽然优势家庭具有获得文化资本的优势,但文化资本并未显示出明显的阶层区隔性和排他性,底层家庭仍然可以通过可获得途径提高文化资本,实现阶层的跃升^[5]。高等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尤为明显,赵红霞和王文凤(2019)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代际流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6];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子女代际向上流动更加明显^[7]。

冲突主义则认为教育并没有实现社会的公平,实际上只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教育由家庭背景决定,优势家庭通过影响子代教育进一步影响职业选择,教育成为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本质是通过“符号暴力”再生产优势阶层支配的文化,进而达到代际传递的目的^[8]。父代的教育程度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方式传递给子代,对子女的教育产生影响,显示出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隔代现象^[9],从而起到“文化屏障”的作用^[10]。尽管父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直接影响子女代际流动,但在子代教育获得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11]。父代教育固化现象日益加剧,代际教育不平等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2]。经济资本是家庭物质财富的重要指标,也是教育支出的主要来源^[13]。高收入的家庭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子女的社会流动^[14],其中直接作用意味着高收入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间接作用表现为高收入家庭倾向于对子女更多的教育投资,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能力^[15]。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资本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学习^[16]。随着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的代际传递能力也明显增强^[17]。布迪厄(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家庭所拥有的能够积累社会能量和资源的社会关系网^[18]。社会资本优越的家庭通过亲戚朋友社会关系网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帮助,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在社会阶层流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村家庭对于社会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常与“弱势阶层”联系在一起,代际社会流动不明显^[19]。

这两种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视角,即教育能否改变命运及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的命运。其中,功能主义从教育对人的发展和对社会的稳定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以提高人的认识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长久发展;而冲突主义更多的强调家庭先赋性因素在个人教育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社会上层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明显优于社会底层家庭。从这一角度出发,优质教育资源和特殊权利被社会上层家庭所垄断,社会底层家庭处于不利的位置,并且较难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的命运,社会处于封闭状态。其实,教育能否实现合理的代际流动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在一个具有流动开放、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社会,处于底层的群体寄希望于未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不利地位,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处于优势阶层的群体具有一种紧迫感,需要不断学习维持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二、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

(一)家庭背景:教育代际流动的先赋性因素

布劳和邓肯(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先赋性因素定义为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教育程度,认为其一方面直接影响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个体教育的获得而产生间接效应^[20]。也有研究指出,母亲更多地承担操持家务和教育子女的任务,对子代教育的获得影响更大^[21]。因此,家庭背景应

该是父代共同形成的家庭社会关系。

科尔曼(1988)认为,家庭背景或家庭资本至少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组成^[22]。其中物质资本可以理解为经济资本,是家庭财富和收入的物质资源,为子女提供接受教育所需的各类费用。人力资本一方面是地位获得模型中父母的教育程度,另外则是可以为子女提供的潜在的认知环境。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增强了家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且,家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需要内嵌于社会资本中,如果父母社会活动未参与到子女教育过程中,将不能有效于子女的进步和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背景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重要指标,富裕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文化资本由制度化、身体化和物化三种形态构成,其中制度化形态是以文凭获得为主要标志的父母教育程度;身体化形态是家庭文化氛围、认知格局等,类似于科尔曼所说的为子女提供的潜在认知环境;物化形态主要以书籍为标志。社会资本是家庭所拥有的能够积累社会能量和资源的的社会关系网,通常以父代工作状况表示,这与地位获得模型中“父亲职业地位”相一致。

家庭背景包含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经济资本为子女提供了获得高质量教育资源的物质保障,家庭文化资本内化于对子女的教育习惯、教育方式和教育态度中,家庭社会资本通过父母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网而对子女的教育产生效果。

(二)文化品格:教育代际流动的自致性因素

不同家庭对待子女的教育具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对于父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城镇中产家庭来说,这些家庭更重视子女教育,通过购买书籍,参加课外补习等教育支出,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23]。同时,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家庭更重视培养和谐的亲子关系,父母经常与子女一起参观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等文化氛围浓厚的场所,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增强了亲子关系,为子女营造了一个愉悦、温暖、舒适的成长和学习环境。因此,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城镇中产家庭表现出重视子女教育,并且有能力为子女创造良好教育环境的文化品格。而对于农村底层家庭来说,情况大不相同。农村底层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往往较低,且没有时间和精力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与城镇中产家庭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和劣势。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我国是血缘、地缘占据主导地位的关系型社会,对于广大农村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农村作为一个以熟人为关系的社会,形成了以邻里、家族为主要特征的广泛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种社会交往关系表现在子女教育方面,即呈现出对学业优异家庭子女的认同和效仿。对于农村弱势家庭来说,父母教育水平较低,但在邻里和家族范围内常有因教育而获得成功的先例,这对众多家庭和他们的子女形成了榜样和示范作用^{[24][25]},会激起他们对教育的认同和学习的动力。其实,大多农村底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并不亚于城市中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在他们看来,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是改变现实困境和实现子女向上流动的重要选择。这种对教育的期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对子女学业的严格督导和对有限物质条件的充分挖掘。在这种家庭生活的农村底层子女,往往与家庭联结成“命运共同体”^[26],表现出热爱读书的文化性格以及知识改变命运的内驱力和奋斗意识,促成了个人形成勤奋、努力、坚韧、自律等自致性品格^[27]。这是农村底层家庭子女由劣势家庭背景转化为个体内驱力的文化品格,对于实现个人教育获得,进而改善不利地位具有重要价值。

文化品格是指在家庭背景的影响下,个体所形成的对知识的强烈渴求、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矢志不移的理想人格追求等自致性性格特征。这种文化品格对个体教育获得具有正向的导向作用。

(三)时代特征:教育代际流动的社会性因素

传统的教育代际流动模式将以家庭背景为主要内容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文化品格为主要内容的自致性因素作为分析视角,但鲜有以时代特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因素考虑在内。个人的教育获得和发展不能脱离社会时代背景而独立存在,因此,从社会视角考虑代际流动问题尤为必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教育获得能力和获得方式。其中,家庭的经济资本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提高。在一个较低生产能力的社会,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且回报率不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家庭的收入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能够实现多种价值选择,为社会成员通过接受教育向上流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传统社会,教育资源有限,而且教育机会被优势阶层垄断,很难通过获得优质教育以改善自身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教育逐渐向大众开放,社会成员拥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同时,由社会进步而提高的认知水平也是文化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本存量在社会进程过程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由于父母工作职业是家庭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工作职位和工作类型得到细化,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同时,家庭社会网络不再局限在以血缘、地缘为主导的范围内,而是逐渐超越了地理位置的束缚,渗入到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每一个方面,表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的时代特征。

若将社会时代背景作为分析教育代际流动的前提条件,则不是传统意义层面上个人流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群体流动的现实景象。与此同时,个体流动和群体流动是同步进行、并行不悖的。一方面,个人流动蕴含在群体流动中,是群体流动的一个组成元素,只有每个社会成员具有代际流动的机会,整个社会才有群体流动的可能;另一方面,群体流动是个体流动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全体成员获得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换言之,时代前进的车轮推动着全体社会成员向前发展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会随着时代进步走向新的未来。并且,个人与社会是一个统一体,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个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在一个社会进步、时代文明和市场繁荣的新时期,由考虑个体代际流动转向重点分析社会群体流动是历史必然和时代选择。

三、教育代际流动的实践转向

从教育功能的立场出发,分析代际流动的实践转向,即基于时代背景的考量,代际流动应从以传统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为主要特征的个体流动转向以社会进步为前提条件的群体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全体社会成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较上一代具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个人的相对位置相比上一代或高或低,这就凸显了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教育是整个社会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对于重视教育的个人和家庭而言,个人更有保持自身社会优势或向上流动的可能,但其中的主流特点仍然是以社会进步而形成的群体流动为表征。

(一) 个体功能:发挥教育在群体流动中培养人才的作用

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教育对具体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作用^[28]⁹¹。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只有个人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整个社会才具备群体流动的可能。即,个人在教育过程中获得的科学知识、人文素养、价值观念等核心要素对于促进群体流动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基础和保障作用。

个人通过教育得以提高的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认知能力,是获得社会职业地位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产生了相应的社会价值。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以提高收入水平。舒尔茨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形式,是提高个人技能的重要投资^[29]。这些知识和能力被运用到劳动力市场,劳动者个人会获得相应的报酬,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从个人角度来说,学历层次决

定了个人获得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在就业竞争和经济回报方面具有优势^[30]。从社会角度来说,个人通过教育获得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均是社会需要的内容,在实现代际流动的同时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通过教育向个体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他们的价值观念、理想品格、创新精神、心理素质、兴趣爱好等非认知能力通过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环境无形中发生了变化,这些因素也是影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方面。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传统人力资本将认知能力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是不充分的,同时非认知能力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社会经济表现^[31]。青少年时期,是培养一个人健全心灵和确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尤其在大学阶段,学生个体在浓郁大学文化的浸染下,通过接受专业文化知识,参加各类组织和集体活动,完成课上课下学习任务,将会培养好奇心、同理心、责任心,焕发高昂的情绪和进取的精神,形成坚韧的毅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体现在学生身上可贵的非认知能力,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将成为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工作和敢于拼搏的强大内驱力。

(二) 选择功能:发挥教育在群体流动中选拔人才的作用

教育的选择功能是指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根据社会分工的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受教育者个体进行评估、鉴定和分类,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教育层次和类型中,进而输送到不同工作岗位上去的活动。教育的选择功能强调社会对不同类型层次教育的认可,受教育个体依据其学历专业和兴趣特长进入不同的工作单位和组织,实现人尽其才,同时满足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和期盼,是社会成员获得向上流动的渠道和途径。

在社会就业市场,用人单位希望招聘到相应工作岗位的求职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并不能全面了解求职者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文凭证书作为求职者的教育信号起到了很好的教育选择作用。文凭从某方面可以反映求职者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暗含着他们工作能力的强弱,因此文凭成为职业准入的必要条件。在“文凭社会”的宏观背景下,文凭和学历在劳动力市场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职业获得的必要条件,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愈加明显。其中文凭高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这里工资高、福利好、晋升快、工作条件优越;文凭低者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这里工资、福利得不到保障,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渺茫。文凭作为文化资源决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成为社会成员和市场共同追逐的对象。社会成员为了改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积累文化资源,在实现代际流动目的的同时提高了社会整体教育水平。

在现代社会,教育的选择功能将社会成员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和岗位中,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合理流动。对于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成员,教育提高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通过获得大学文凭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使处于劣势的成员有机会通过教育在职业选择中具有相对优势,成为他们获得工作机会,进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从高等教育的选择功能来看,出身底层的学生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与优势阶层同样的大学教育机会,具备了社会需求的基本条件,是他们实现阶层流动和阶层循环、进而步入中上层的重要方面^[32]。教育的选择功能从另一侧面可以促进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性流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对学历和文凭的要求相对提高。社会群体在富于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为了适应时代的变迁和获得理想的职业,往往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获得新技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社会的整体水平,个人和社会均向上迈进了一个新台阶。

(三) 社会功能:发挥教育在群体流动中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指教育对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支持、维护和推动的作用。教育是推进政治民主化、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传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是促进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一个文明开放、稳定和谐的社会,社会成员具有更多实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社会的群体流动代替个人的代际流动成为时代主流。

教育的社会功能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强调教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的政治功能即教育对维护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变革所具有的功能,表现为通过教育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民主平等的政治环境、举措得力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和谐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成员将充满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教育的经济功能通过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形成人力资本,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文化是教育的载体,并且通过教育的形式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传递给下一代。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承与发展、延续与创新的过程,通过教育,将人类优秀文化内化为社会成员奋斗的精神力量^[33]。在一个开放和谐包容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社会成员更有机会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个人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群体流动的目标。

教育之所以能够形成群体流动的社会现象,并非教育单独可以完成的,社会文明和价值导向、政治保障和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等也起着重要作用。社会进步改善了社会流动的特征,即从以家庭背景为主的先赋性因素转向以个人努力获得教育为主的自致性因素,给了更多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打破了子承父业的传统代际流动模式。同时,在一个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整个社会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将处于群体流动的美好时代。

四、总结与启示

教育作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自致性因素,得到了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对于教育能否有效实现个体的阶层流动,功能主义和冲突主义具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实现个体向上流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冲突主义认为教育未能实现社会公平,是优势阶层社会再生产的工具。本文则在分析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的基础上,从家庭背景、文化品格和时代特征三个方面厘清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提出对代际流动问题的分析,要从个人相对位置的移动转向以社会进步为前提条件的群体流动的观点。教育具有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首先,个人通过教育获得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是个人向上流动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社会群体流动的组成元素;其次,发挥教育的选择功能,实现人尽其才的社会目标;最后,通过教育的社会功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良好社会环境,推动转向群体流动的教育代际流动模式。

相比传统的教育代际流动问题只关注个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来说,群体流动具有更大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从代际流动的关注角度来说,群体流动在考虑个人相对位置变化的同时,重点关注社会进步带来的全体社会成员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认为个人和社会是一个统一体,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进步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贡献,更加具有系统性特征。第二,从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来说,个人代际流动主要关注以家庭背景为主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教育获得为主的自致性因素,群体流动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时代背景或社会环境的基础性地位,认为在一个开放包容和谐的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循环的体系内,为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基础条件。第三,从代际流动的理论价值来说,群体流动超越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或优势阶层再生产功能的观点,认为社会整体相对位置的提高是历史进步和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能够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更多向上流动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参 考 文 献]

- [1] Zhong, Deng, Treiman, et al.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2):391-428.
- [2] 范静波. 家庭资本、代际流动与教育公平问题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4).
- [3] 郭丛斌, 闵维方. 教育: 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教育研究*, 2009(10).
- [4] 陈爱丽, 郑逸芳, 许佳贤. 教育能促进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吗?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证据[J]. *教育与经济*, 2019(6).
- [5] 余秀兰, 韩燕. 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2).
- [6] 赵红霞, 王文凤. 致贫理论视阈下高等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基于 CHNS2015 数据库的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4).
- [7] 乐志强. 高等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作用——基于“读书无用论”现象的思考[J]. *北京社会科学*, 2018(10).
- [8] 布迪厄, 帕斯隆著. 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邢克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9] 商晨, 茹玉骢. 教育是否有助于社会垂直流动? [J]. *浙江学刊*, 2018(6).
- [10] 陈卓. 桥梁与屏障: 当今中国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09(6).
- [11] 朱月季, 张颖, 陈新锋.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 CHIP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 [12] 张义祯. 代际教育流动及其不平等实证研究[J]. *东南学术*, 2016(4).
- [13] 张山. 家庭资本、教育与社会流动[J]. *经济问题*, 2018(12).
- [14] Zelinsky T, Mysikova M, Vecernik J. Occupational Mobility, Educational Mo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sadvantages in Europe[J]. *MPRA Paper*, 2016(3).
- [15] D'Addio AC.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sadvantage: Mobility or Im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or OECD Countries[J]. *OECD Papers*, 2007(3).
- [16] 吴愈晓.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J]. *社会学研究*, 2013(4).
- [17] 邹薇, 马占利. 家庭背景、代际传递与教育不平等[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2).
- [18]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241-258.
- [19] 周向伟, 张天雪. 感知与突围: 教育场域中农村家庭的阶层代际流动——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6).
- [20] Peter M. Blau and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 New York: Wiley, 1967.
- [21] 周世军, 李清瑶, 崔立志. 父母学历与子女教育——基于 CGSS 微观数据的实证考察[J]. *教育与经济*, 2018(3).
- [22] Coleman, Jame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
- [23] 刘堃, 郭菲. 城乡内部阶层分化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兼谈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23).
- [24] 王小红. 基于教育社会分层视角的农村学生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 [25] 刘谦, 陈颖军. “寒门出贵子”现象的理论再探究——聚焦学业过程与社会文化要素[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4).
- [26] 熊和妮. 命运共同体: 劳动阶层教育成功的家庭机制研究[D]. 硕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2016.
- [27] 杜亮, 刘宇. “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关于学校教育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5).
- [28] 王北生. *当代教育基本理论论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 [29]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 [30] 杨中超,岳昌君. 学历、专业对高校毕业生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研究, 2016 (10).
- [31] 李晓曼,曾湘泉. 新人力资本理论——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动态[J]. 经济学动态, 2012(11).
- [32] 吴坚. 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分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 [33] 王北生,王萍. GNH 视域中的当代教育功能[J]. 教育研究, 2008(3).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 Theoretical, Logical and Practical Turn

Li Wenhua Zhang Wun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Henan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acquisition of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ducation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unctionalism believes tha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mproving individu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realizing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hile conflict doctrine believes that education is a tool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atus of the dominant class. The internal logic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ducation shows that ascribed factors, self-inducing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not onl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but also provide a possible path for social group mobility. By exerting the educative function, choice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of education,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all members of society to move upward and realize their own values,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beautiful social environment for group mobility.

Keywords: educ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e turn; individual mobility; group mobility

[责任编辑:刘力]